

王明蓀主編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六編 第十九冊

姚文棟邊防思想研究

石岩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六編

王明蓀主編

第 19 冊

姚文棟邊防思想研究

石岩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姚文棟邊防思想研究／石岩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188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 19 冊）

ISBN 978-986-404-764-2（精裝）

1. 姚文棟 2. 地理思想 3. 邊防

618

105014271

ISBN-978-986-404-764-2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404-764-2

姚文棟邊防思想研究

作 者 石 岩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9 月

全書字數 165989 字

定 價 十六編 35 冊（精裝）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姚文棟邊防思想研究

石岩 著

作者簡介

石岩，男，1969年5月出生，河北人。1987年至1991年在河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就讀，獲得文學學士學位；2002年1月獲得河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學位；2015年6月河北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教育管理工作，在教育法治、教師管理等方面多有研究。論文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論壇、蘭臺世界等學術刊物發表。

提 要

姚文棟生於1853年，1866年考入上海龍門書院，1882年出使日本，1887年奉命考察歐洲，1891年回國後查勘滇緬邊界。姚文棟的「籌邊」思想主要集中於《救時芻言》和《籌邊論》之中，其思想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民族主義傾向。西北籌邊對策：主張加強中央對新疆的控制，設立行省和移民屯墾；引導蒙民耕種。東北邊防策略：中朝關係，提出中朝軍事同盟的思想；中琉關係，提出「琉球換和平」的構想；中日關係，出國前「聯日防俄」，踏足日本之後，提出用兵一說。西南邊防策略：認為雲南得失，關乎天下；而野人山之得失，又關乎雲南。姚文棟論江防海防：認為中國江防海防的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戰略防禦重點方向是東西；提出加強長江水師的建設，將其對內防禦功能擴展到對外防禦。姚文棟的研究成果體現了如下幾個特徵：第一，時代特徵鮮明。第二，「籌邊」思想中的大局觀。第三，親身實踐的作風。第四，姚文棟的邊防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第五，姚文棟的地理學研究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或「功利主義」的特徵。第六，姚文棟邊防思想中的「積極防禦」的構想，對當代中國邊防事業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鑒作用。



目次

緒論	1
第一章 姚文棟的家世及學業	7
第一節 家世	7
第二節 學業	10
第二章 姚文棟西北邊防思想研究	17
第一節 姚文棟論時局	17
第二節 姚文棟的西北邊防策略	21
第三節 尋求出使機會	32
第三章 姚文棟東北邊防思想研究	39
第一節 姚文棟出使日本	39
一、姚文棟與黎庶昌	39
二、積極投身文化交流活動	44
三、尋訪古籍	50
四、介紹日本名家、名著	59
第二節 姚文棟東北邊防策略	64
一、姚文棟對中朝關係的認識	64
二、姚文棟對中琉關係的認識	66
三、姚文棟對中日關係的認識	69
四、姚文棟對日外交思想的轉變	73

第三節 姚文棟的地理學研究·····	77
一、《安南小志》·····	78
二、《日本地理兵要》·····	78
三、《日本國志》·····	80
第四節 姚文棟論江防海防·····	86
第四章 姚文棟西南邊防思想研究·····	91
第一節 周歷西洋·····	93
一、從日本到歐洲·····	93
二、姚文棟駐德期間的遊歷及著述·····	96
第二節 查勘滇緬邊界·····	115
第三節 西南邊防策略·····	118
第四節 外交實踐·····	125
一、在薛福成外交談判中的貢獻·····	125
二、失意北返·····	131
結語：姚文棟邊防思想定位·····	133
第一節 黃楸材的邊防思想·····	133
第二節 徐鼎霖的邊防思想·····	137
第三節 胡傳的邊防思想·····	145
第四節 曹廷傑的邊防思想·····	149
第五節 楊觀東的邊防思想·····	155
第六節 姚文棟邊防思想定位·····	162
參考文獻·····	171
附錄：姚文棟與滇緬邊防·····	177

緒 論

世界歷史每一天都在書寫新的篇章，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每一天都在發生著更緊密的聯繫。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其中，領土與邊界問題向來是人類衝突緣起的根源之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人為災難、戰爭多因此而起。伴隨著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各種幌子下的侵略和各種名義下的瓜分，使戰後留下了無數領土爭端與邊界糾紛，使許多取得獨立的民族國家如芒刺背，牽扯了太多的心神，耗費了大量的精力，成為困擾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制約和阻礙著文明的進步以及經濟社會的發展。有國必有邊，有邊必有防，邊防不會因朝代的變更而隨便放棄，也不會因信仰的不同而肆意取捨。無論在太平洋兩岸，還是在地中海四周，無論塵沙漫野，還是冰雪覆蓋，邊界如同一個國家的鎧甲，保護著血肉之軀不受侵犯，又如同一個民族的鎖鏈，維繫著萬千家園長治久安。

民族問題、邊界問題應該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迴避的，中國也不例外。中華文明的歷史漫長、悠久，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陸海邊界與多國接壤，既有輝煌燦爛的友好交往，也有揮之不去的衝突陰影，形成了獨特的形式與內容。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擴散，插手亞洲的力量逐漸彙聚，問題也變得愈加複雜和難以調和。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框架下，與周邊國家友好相處，為經濟、社會發展爭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伴隨著中國的發展，各種「雜音」開始出現，其中有經濟方面的，如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傾銷與制裁；有政治方面的，如意識形態、人權狀況；還有軍事方面的「中國威脅論」等等。種種糾紛、衝突增多的原因，既

有價值取向的不同，歷史遺留的問題，也不乏「惡意和妄想」。例如：日本製造的「釣魚島國有化」問題、菲律賓企圖強佔仁愛礁、中越南海爭端升級、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等等。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邊界不靖」已經成為現在和可預見的將來不容忽視的突出現象和矛盾。尤其是近年來，在某些「有心」國家的鼓譟、推動和渲染下，各種矛盾激化、升級而顯得地區局勢日益緊張。對此，中國既不能驚慌失措，亦不能掉以輕心。如何展示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的決心，回擊一些國家歪曲歷史事實的企圖，歷史的「鏡鑒」作用不容忽視。

本文研究重點在於，通過還原姚文棟的外交實踐，通過分析他的一系列著作，探討他在大的時代背景下，邊防思想的形成過程。

外交史研究是史學研究的永恒主題之一。所謂「外交」，即指國家間的交往。既然是交往，自然可以區分「交好」與「交惡」之別。例如，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因此「戎」，可以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理解為國家間相處的一種方式，可以看作是外交的延伸，是國家間解決「交惡」的最終手段。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來，交通、通訊工具的發展也帶來了國家間交往的日益密切，各種糾紛與利益衝突的增加亦在所難免，通過外交渠道溝通、調解，以避免衝突，維護人類和平，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史學研究領域，外交史（或中外關係史）研究一直是傳統領域，是國家、民族存續和發展的重要命題之一，追本溯源，才能發揮史學研究的參考和鏡鑒作用，這也是外交史（或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當今世界的發展，不但顯示出這些研究的重要，而且也為後續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更廣闊的空間。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對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長盛不衰的要求。

清廷派遣早期駐外使官的目的非常明確，使官均負有「以修和好而固邦交」的職責〔註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此前斌椿、志剛、崇厚有三次臨時性出訪，總署亦抱有「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註2〕的想法。在近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領域中，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後簡稱「總理衙門」）的創設，無疑是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中國近

〔註1〕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二輯0011，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63頁上。

〔註2〕 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四，卷三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621頁。

代外交初期的發展可概括如下：1861 年總理衙門的設立通常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外交之肇始。自此以後，1866 年派員隨赫德考察西方諸國，1868 年派遣「浦安臣使團」等一些列重大舉措相繼實施，但是 1875 年清王朝開始派遣駐外使官，則是中國近代外交體制及外交活動初步建立的標誌事件。十餘年間，伴隨著洋務運動方興未艾，中國外交領域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駐外使官多有著述，或日記，或遊記，或筆記，或詩文，或譯作，或專著，蔚為大觀，成為晚清珍貴史料中的一大門類。從內容來看，或介紹風土人情，或介紹海外逸事，或介紹西洋政體，或傳播科學知識，依照個人的旨趣抒發，涉獵既多，不一而足。具體到姚文棟而言，他是晚清近代外交實踐的早期參與者，從日本到歐洲，前後近十年，見識廣，著述多。又受命調查印、緬商情，參與雲南勘界事宜。他的境外經歷為他的邊防思想提供了有力的實踐支撐。他兼通東亞、東南亞局勢，對日本、琉球、朝鮮半島、越南、緬甸、俄羅斯各國用功最深。以姚文棟為代表的外交官群體是中國國防、外交近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關於姚文棟的研究涵蓋了外交、史地、軍事、文化交流等多個領域，紛繁複雜，卻又統一於「邊防」。邊防思想既是姚文棟投身時代洪流的出發點，也是其最終的歸宿。

從邊防角度來看，本研究選取的「東亞」區域有著不同於歐洲的特點。近代的亞洲，中、日是有著各自獨立國家意志的、主權相對完整的國家，因此中日外交關係實際上決定了整個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外交關係的態勢。至今，中日關係仍是決定亞洲地區局勢的重要因素之一。東亞地區是中國的傳統勢力範圍，晚清中國國際地位的下降，日本崛起等諸多因素，可以使我們在關注中日關係的同時，兼顧中朝、中國與琉球、中緬關係，甚至中越關係的變化，這樣能夠更加全面、深刻的瞭解近代中國外交是如何從「宗藩制」向近代化演變的過程。

本文的研究時段，截取於中日近代外交關係發展的早期，即指自 1877 年清王朝派遣首位駐日公使起，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止，其間近二十年的時間段。選取的研究對象避開了既往研究中成果最豐富的部分，即駐日公使、副使、參贊等高級官員，同時將其間發生的重大外交事件，例如：日本侵臺、日本侵佔琉球、中日在朝鮮的博弈、中日修訂《天津條約》和中法戰爭等作為研究的背景，關注點並非在於這些事件的本身，更加關注外交官群體中低級官員在這段時間中的行為、觀念的變化，以及他們是如何影響整

個事態的發展的，並且通過他們與公使、非外交職業官員、普通知識分子的對比，對其歷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準確的定位和評價。

姚文棟於邊疆地理學方面的成就體現在：《日本地理兵要》，是中國近代第一部日本地理志，總署特予刊行，可見其對當時「洋務運動」的重要程度。另外，姚氏所著《日本國志》，國內至今未見，但是從姚著《東槎雜著》中的《日本國志凡例》可見一斑。姚氏的《日本國志》成書後，日人川口鶯爲之作跋，稱「姚君志梁成《日本國志》若干卷，蓋遍搜我邦人撰著集其大成，猶魏默深之於《海國圖志》也，然默深身未嘗出禹域，其所志非其所踐，網羅雖密，采擇未精，恐未足爲一部完書也。志梁則久客於我邦，足跡殆遍通邑大都，又親與我學士大夫交，於內地形勢了若指掌。斯編之翔實，可以徵信於後，豈《海國圖志》之比哉」〔註3〕？朋友之間的幫襯文字，難免有溢美之嫌。但川口氏至少指出了一個事實，即從可信度方面，姚氏《日本國志》遠勝《海國圖志》。這也並非全是溢美之詞，囿於不同的時代、環境、空間和職守，二人的著作存在優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學科發展的首創與深化的關係，各自有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是歷史發展中密不可分的銜接。畢竟，可以和《海國圖志》相提並論就是一種榮耀。

還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官階各有高低，職守各不相同，但是自 1840 年以後，整個中國社會的危機感、壓迫感日益加深，雖然由於學識、環境、見識和立場各不相同，最終選擇解決危機的道路也不相同，但是以「救亡圖存」爲最終目標卻是當時社會的共同認識。具體到姚文棟而言，質樸的「強國夢」與「開眼看世界」得到了統一，他也很自然的成爲當時進步官員、開明知識分子之觀念、思想變遷的一個縮影。作爲外交官的姚文棟與近代中國早期「睜眼看世界」的官員們，以及國內主持「洋務運動」的官員們不可同日而語，他在認識和觀念上都發生了更爲深刻的變化，換言之，以姚文棟爲代表的外交官群體是中國國防、外交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學界目前尚未有系統研究姚文棟及其思想的專著、學位論文，學術論文也屈指可數。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最早關注姚氏的是日本漢學家實藤惠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闢專章講述了「姚文棟的故事」，介紹了姚氏在出使日本期間的作爲。還特地比較了黃遵憲和姚文棟，稱「姚文棟是第二個黃遵憲，……（二

〔註3〕川口鶯：《日本國志跋》，姚文棟：《海外同人集》卷上。

人)均多日本學者友人,且均用心研究日本國情,除此前後二人外,後來好像不見再有類似的人,他認為「此二人的人物、文章、業績,若想比較起來,那黃為優秀。可是,仔細考察起來:各有各的特色」,即在「質」和「量」兩方面,黃、姚二人各擅勝場。實藤先生還專門分析了姚文棟的立場和動機,在推動中日親善背後的「另一面」,在經歷了琉球事件、朝鮮問題和日軍侵臺後,姚氏曾言:「現在是與其講道理,不如講實力的局勢」,堅決主張對日採取強硬立場。並進一步指出姚氏編著《琉球地理志》,「不是為學問上的目的,確為時局的」。不必諱言,實藤先生對姚文棟的觀察和評價大體算得上公允。

〔註4〕事實上,姚氏東遊日本,其身份並不是單一的學者,更重要的他身負使命,因此實藤先生所質疑的「另一面」,也算是題中應有之義,不可依其品評姚氏「人物」優秀與否。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偉明著有論文評價姚文棟,在充分肯定姚氏成就和作用的同時,指出其日本研究的不足:「對中日文化和外交關係的發展等重要問題缺乏明確而有系統的看法,使他無法與黃遵憲等一流日本通看齊」;姚文棟長期駐足於東京,且不懂日文制約了他對日本的瞭解。

「雖然以著述的質素和個人的見識而言,他不算是位『一流的日本通』,但他對研究日本的貢獻是巨大的」。(註5)北京大學王曉秋教授的專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花了一定的篇幅介紹姚文棟,肯定姚為「有心人」,「在處理日常外交事務以外,把對日進行調查研究和文化交流,也視為自己的重要使命」。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寶平教授,是著專文研究姚文棟最多的學者,著有《新發現的姚文棟的代表作——〈日本國志〉》(註6)和《黃遵憲與姚文棟——〈日本國志〉中雷同現象考異》。(註7)兩篇文章一脈相承,根據王寶平的研究,發現兩部同名著作間存在雷同的現象,他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資料同源」。並且發現,姚氏所著《日本國志》「實非姚的研究著作,而是全文譯自《日本地志提要》」,「姚文棟在《日本國志凡例》中

〔註4〕〔日〕實藤惠秀著,陳固亭譯:《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中華叢書》,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1年,第68~89頁。

〔註5〕吳偉明:《姚文棟——一個被遺忘了的清末「日本通」》,《日本研究》1985年第2期。

〔註6〕王寶平:《新發現的姚文棟的代表作——〈日本國志〉》,《中國研究月報》,1999年5月號。

〔註7〕王寶平:《黃遵憲與姚文棟——〈日本國志〉中雷同現象考異》,胡令遠,徐靜波主編:《近代以來中日文化關係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23~232頁。

所列的 99 種書目爲故弄玄虛」，同時他也承認，姚文棟「積極開展日本研究……，聲名雖不及黃遵憲，但研究日本著作之多，無人可出其右」，「綜觀全文，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指姚氏《日本國志》）是一部學風嚴謹、水平上乘的譯著」。^{〔註 8〕}王寶平教授的評價可謂洞若觀火、客觀平允，爲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邊防思想方面。該領域至今只有上海社科院張敏所著《略論姚文棟邊防思想及實踐》一篇論文^{〔註 9〕}。該文以姚文棟一生致力於中國邊防事業爲線索，通過分析他各個時期的成果，揭示了姚文棟邊防思想的核心內容，稱其「在邊疆和外交學兩方面，都有學術建樹和重要實踐」。張敏的論文無疑爲姚文棟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抓住了當時一些鑽研「經世學」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機和行爲歸宿。

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方面。以此爲視角的論文有三篇，柳和誠的《姚文棟其人和他的藏書》^{〔註 10〕}和《姚文棟與日本古佚書》^{〔註 11〕}，陳捷的《姚文棟在日本的訪書活動》。^{〔註 12〕}該三篇論文系統地介紹了姚氏在保護傳統文化方面的貢獻。

〔註 8〕 王寶平：《黃遵憲與姚文棟——〈日本國志〉中雷同現象考異》，第 230～231 頁。

〔註 9〕 張敏：《略論姚文棟邊防思想及實踐》，《史林》，1999 年第 2 期，第 73～79 頁。

〔註 10〕 柳和誠：《姚文棟其人和他的藏書》，《圖書館雜誌》，2003 年第 7 期，第 76～78 頁。

〔註 11〕 柳和誠：《姚文棟與日本古佚書》，《藏書家》第 8 輯，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第 83～85 頁。

〔註 12〕 陳捷：《姚文棟在日本的訪書活動》，《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 年第 1 期，第 139～143 頁。

第一章 姚文棟的家世及學業

1929年9月29日，《申報》發表了一篇訃告，題為「耆紳姚文棟作古」，稱「邑紳姚文棟，字子樑，為姚子讓之胞兄。曾出使德日俄法國二十餘年，為外交界前輩。嘗查勘滇緬界域，於吾國權利多所換回，後回片馬案，清廷畏蒞失敗，憤而退隱南翔。昨日歿於寓次，年七十八歲。聞者惜之」。^{〔註1〕}

訃告寥寥數語，惜字如金，即便如此，「出使德日俄法國二十餘年，為外交界前輩」點明其社會地位，「查勘滇緬界域，於吾國權利多所換回」指出其外交貢獻，「清廷畏蒞失敗，憤而退隱南翔」說出其人生遺憾，「聞者惜之」道出了世人歎惋。這篇堪稱墓誌銘的訃文，評價之精當，概括之全面，在今天之研究者看來，依然頗具影響。在「大變局」的晚清時期，探索求新、憂國憂民之人士風雲際會，前赴後繼，但有此經歷者也並不多見。姚文棟從一個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步入近代外交事業先行者行列的過程，可以視作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早期外交官群體培養成長的一個縮影。

第一節 家 世

姚家的興旺過程，可以看作是一般中國傳統社會發跡的標本，出身微寒，其志彌堅，通過祖孫幾代人的努力，終跨入上海本邑鄉紳之列，家族命運輾轉起伏之間與時代變遷的大格局暗相契合。

姚文棟的曾祖父姚秉衡（字鑒廷，號煦洲），「精堪輿，有隱德」。^{〔註2〕}

〔註1〕《姚文棟訃告》，《申報》1929年9月29日，第十四版。

〔註2〕吳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縣續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臺北：

勘輿學一門，源遠流長，歷代名家輩出，專門著作更是汗牛充棟，至今仍傳承不絕。相陽宅與建築設計結合，成為設計領域中的重要流派，中外多所大學開設了相關的專業。相陰宅，則保持了一貫的神秘玄學的特點。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古今在中華文化圈中，風水師都成為社會中一種不可或缺的職業，「大師」更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對象，很多希望查勘風水尋找不幸根源或者通過風水改變命運的人，在風水師面前往往一擲千金。因此，姚家最初財產積累的脈絡清晰可見。

雖然姚秉衡通過「堪輿」改善了家人的生活狀況，但並不意味著這是一門值得作為家族傳承的生存手段，因為在他看來，看風水缺少尊嚴，甚至算不上一份正當體面的職業，比之商人亦有所不如。小康之後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中國傳統社會，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文或武」成為提升社會地位僅有的途徑，和大多數人的選擇一樣，姚秉衡選擇了科舉。但是，走上科舉之路，對於姚家還是過於遙遠，必須先轉變成被鄉里所認可的「讀書人」，這樣一個身份被「漂白」的過程，充分體現在姚家的第二代身上。

祖父姚錫嘏（字椿齡，號春齡），「嗜吟詠」。姚錫嘏本人科舉無望，轉而經商，五十餘年積累了不菲的家資，在讀書作詩自娛的同時，內心深處對科舉本身的渴望從未降低過。從姚文棟母親、姑母的文化程度來看，姚家對子弟教育的重視亦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姚錫嘏還以積極的行動來促成姚家在地方上地位的穩固。通過自身的慈善行為，救濟鄉里，是中國傳統社會地方士紳立家的重要方法之一，社會動蕩的時期更顯得尤為重要。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鄉村士紳一代代的文明傳承，中國文化的內涵才得以綿延。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江南一帶大戰正酣，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已。姚氏父子「自己未以迄丁卯九年之間，……買嘉定縣租田三四百畝，崑山縣租田一百餘畝。蓋其時兩縣民皆逃亡，大都流寓，海上田地荒蕪，貲財匱乏，無以為生」，「春齡府君（姚錫嘏）憫而散財，並不利其土田也。……以為所買之田雖蕪無生產，聊以為賑耳。亂後田盡草萊，無人耕種，招集流亡，貸錢墾闢，久而後獲佃租」。^{〔註3〕}需要注意的是姚氏父子買地的目的並不單純是為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卷18，31頁。

〔註3〕姚明輝編輯，戴海斌整理：《姚文棟年譜》，《近代史資料》總125號，第140頁。

了獲利，或者說更重要的是爲了「散財」、「賑濟」，最終目的是行善積德。姚錫嘏是姚家發展中重要的一環，有著承上啓下的作用，既提升了家族的經濟實力又在地方鄉里樹立了良好形象。

姚文棟成長於動蕩的年代，1853年初，太平軍定都南京。八月間，爲躲避上海小刀會起義，祖父姚錫嘏舉家遷往嘉定南翔，此時姚文棟才兩歲。這次避難歷經四年，直至1857年，姚家才又遷回上海。在這最初的動蕩歲月之中，姚文棟也完成了其最初的啓蒙教育，而擔任這一職責的是他的母親和姑母。他曾回憶道：「幼年夜讀依祖父臥室燈，因他室無燈之故。祖父半夜夢回，見予讀猶未輟，怡然復夢」〔註4〕，可以想見，在那樣的年代，在那樣的夜晚，看到小孫子讀書不輟，猶如繁雜喧囂中突然見安寧，彷彿看到家族振興的希望綿延傳承，感慨之餘，姚錫嘏心裏應該是幸福且滿足的。

1859年，對姚家來說是喜慶的一年，姚文棟之父姚元滋參加江南鄉試中了舉人。這也使得姚家的大家長姚錫嘏喜出望外，感歎道：「承先隱德深叨庇，裕後栽培望爾曹」。（註5）姚錫嘏的感慨既承載著自己的夢想，更飽含著改變家族命運的期望，希圖科舉進身是一般中國社會底層最樸素的願望。爲善——積德——科舉應試，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最符合社會價值判斷的循環，也是底層鄉紳振興家族的累世追求。姚家也是這樣，所以子弟科舉成功後，「漫捲詩書喜欲狂」之餘，姚錫嘏不禁感歎先人「隱德」的庇祐。姚元滋中舉後，1860年初，按原計劃北上參加第二年禮部考試，正值捻軍在安徽境內活動頻繁，不得已返回上海。七月間，太平軍攻抵上海，姚家避難浦東。1861年末，太平軍攻抵浦東，姚家再次倉皇出逃，避難法租界。1864年，太平軍被剿滅，姚錫嘏重建了毀於戰火的上海西門內祖宅，至此總算穩定了下來。姚元滋雖然終未能再進一步，但承載家族希望的姚文棟和姚文楠兄弟開始了正式的求學生涯。

十餘年的社會動蕩，江南生靈塗炭，可是對於姚家來說卻有著更爲深遠的意義，姚家的振興過程加快了。《（同治）上海縣志》記載，「姚秉衡，孫元滋職貤贈；姚錫嘏，子元滋職封」朝議大夫。（註6）朝議大夫，閒職，無職權，很顯然是清廷對天平天國運動期間上海本邑士紳積極捐贈的回饋，表彰安撫

〔註4〕 姚明輝編輯，戴海斌整理：《姚文棟年譜》，《近代史資料》總125號，第139頁。

〔註5〕 姚明輝編輯，戴海斌整理：《姚文棟年譜》，《近代史資料》總125號，第139頁。

〔註6〕 應寶時修：《（同治）上海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卷17，29頁。

意義大於實際價值，但對於急於提高社會地位的姚家來說具有重大作用，猶如春夜喜雨。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奉贈是以姚元滋的名義進行的，其中作為大家長的姚錫嘏的意志不容忽視。正是這樣看似靜悄悄的變化，籠罩在姚錫嘏身上「附庸風雅」的商人色彩進一步淡化，其子姚元滋身上的「知識分子」色彩悄然增強。此時，姚家已經基本擺脫了底層的社會地位，步入了地方士紳的行列。

第二節 學 業

從姚文棟十三歲起，祖父為其聘請塾師學習時文，以應對科舉考試，第一次「名在百外」，第二次「名在五十餘」，第三次以第十八名的成績得中秀才。經過敬業書院短暫學習後，1866～1867年（同治五～六年）姚文棟在父親的建議下考入了後來負有盛名的上海龍門書院。他在回憶中記載，「先世自王父春令府君服膺程朱之學，先大夫以是承先啓後，未嘗逾儒門界限一步。文棟丙寅入黌宮，先大夫慮溺於科舉之學，或且誤入歧途，恒令溫習《朱子小學》、《近思錄》兩書，以端趨向，以堅志趣。時宮允師方講吾邑，提倡理學，東南宿儒多出其門，先大夫遣文棟從學焉」。^{〔註7〕}入黌宮，即入學堂。姚元滋怕兒子們「溺於科舉之學」，而令習朱子之學以端趨向。他的這種選擇，雖與姚錫嘏略有不同，恰恰體現出與時代潮流的契合，晚清理學振興的源頭正在於此。這就不得不提到「同治中興」這一大的歷史背景。鴉片戰爭後，所謂中興者，概言之包含器物 and 思想兩個層面。就思想層面來說，恢復傳統秩序（包括社會秩序和思想秩序）和培育新型人才不過是一體兩面而已，最終在教育中達到了統一，而程朱理學也成為晚清的官方哲學。內外交困，社會動蕩也必然影響知識分子的學術取向。姚文棟所就讀的龍門書院，正是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官員振興教育的倡導下興辦的。龍門書院創辦不久，即蜚聲江南，是與其辦學宗旨分不開的。

南宋大教育家朱熹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盛極一時，在其後數

〔註7〕 姚明輝編輯，戴海斌整理：《姚文棟年譜》，《近代史資料》總125號，第141頁。姚氏所記入學年份有自相矛盾之處，如確為「宮允師方講吾邑」之時，則為1867年（同治六年），詳見楊抱樸：《劉熙載年譜》（三），《遼東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姚氏再記有同治九年「先府君自肄業龍門書院，至是五年」的說法，第142頁，則姚文棟入學年份則為1866年（同治五年）。但無論如何，姚文棟是「融齋龍門弟子」的早期成員之一。